

福建洞天福地景观研究现状

Research Status of Fujian Taoist Nature Sanctuary

田舒禾 金荷仙* 杨梦欣
TIAN Shuhe JIN Hexian* YANG Mengxin

(浙江农林大学风景园林与建筑学院, 杭州 311399)
(Colleg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Zheji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China, 311399)

摘 要

洞天福地是道教神仙的修道场所, 在历史的更新演化中留下了丰硕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遗产。福建“福”源深厚, 以山川形胜而论, 该地域洞天福地是全国洞天福地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足以当福地洞天之名。搜集、梳理福建洞天福地相关史料及研究成果, 通过地理考证、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三个方面分析福建洞天福地的研究现状, 着重从闽越文化和神仙文化、儒释道文化、海洋文化、易学文化、古代艺术家审美视角5个方面研究福建洞天福地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尺度阐述名山大川、原有生态环境、洞室及衍生建筑对福建洞天福地人文景观的影响。最后, 总结探讨福建洞天福地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特点并提出对未来的展望, 对福建洞天福地的景观保护与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风景园林; 洞天福地; 道教; 福建; 景观; 研究现状; 展望

Abstract

Taoist Nature Sanctuary (TNS) is revered as the abode of Taoist immortals and has bequeathed a rich legacy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throughout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Fujian's "blessing" source is profound regard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this are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Dongtian Blessing map, enough to be the name of TNS.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research results related to Fujian's TNS. It also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Fujian's TNS through three aspects: geographic evidenc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humanistic landscapes. Focusing on five aspects of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Fujian's TNS, namely, the culture of Min-Yue and immortals, the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maritime culture, geomancy culture, and the aesthetic perspective of ancient artists; then from the macro - mesoscopic - micro-scale of namiyama system, the origi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ves and derivative buildings on the influence of humanistic landscape of Fujian's TNS. Finally, it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angles,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ujian's TNS and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prospect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landscape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Fujian's TNS.

Key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Taoist Nature Sanctuary (TNS); Taoism; Fujian; landscape; research status; prospect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4)09-0010-09
DOI: 10. 12193 / j. laing. 2024. 09. 0010. 002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04-17
修回日期: 2024-05-21

田舒禾

1998年生/女/福建三明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

金荷仙

1964年生/女/浙江东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康复花园的研究与实践、植物景观规划设计

杨梦欣

1999年生/女/河北石家庄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植物应用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lotusjhx@zaf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视嗅感知协同作用下的城市绿地植物配置研究”(编号: 5227808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芳香植物配置对人体亚健康干预效应研究”(编号: 51978626)

文化重要的思想基地。武夷山的生态价值也极为突出，高度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与完整性。白玉蟾、葛洪、陶弘景、司马承祯等道教宗师于两地或传道修身，或得道飞升^[1]，其历史地位可见一斑，福建洞天福地历史地位突出，文化积淀深厚，福建的名称与道教洞天福地也有密切的文化渊源。

“福建”取自福州府与建州府的首字，其“福”源自福州西北的福山^[2]，后经史书碑刻记载为“董奉山”（表1）。福州城内屏山、乌山、于山三足鼎立（图1），州藏林间，山水风光之胜，可比于道家海上三仙山^[3]，黄裳从道家角度将其视为“洞天福地”，堪舆家更以“山川形胜”指出其建城理由^[4]。故福建之福源于福州福山（董奉山），福山之福则源自神仙之福与董奉造福百姓之福，其地名的历史人文承载着先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与道家追求人间仙境的信念不谋而合。

2019年6月，第一届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宁德召开，以“霍童洞天”拉开洞天福地以文化景观类型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因此，对福建洞天福地的自然、人文景观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对推进福建洞天福地的保护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洞天福地研究现状

早前学者对“洞天”“福地”“洞天福地”概念的起源进行探究^[10]，发现影响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及七十二福地排序的重要因素，涉及其地理位置、出世次序和真人仙阶等，其中出世次序具有直接性，决定洞天福地的等级，如福建的霍童山霍林山洞位居三十六小洞天之首，但拘泥于洞天福地的名称、位置 and 范围，缺乏对洞天福地的形成发展及脉络走向的系统性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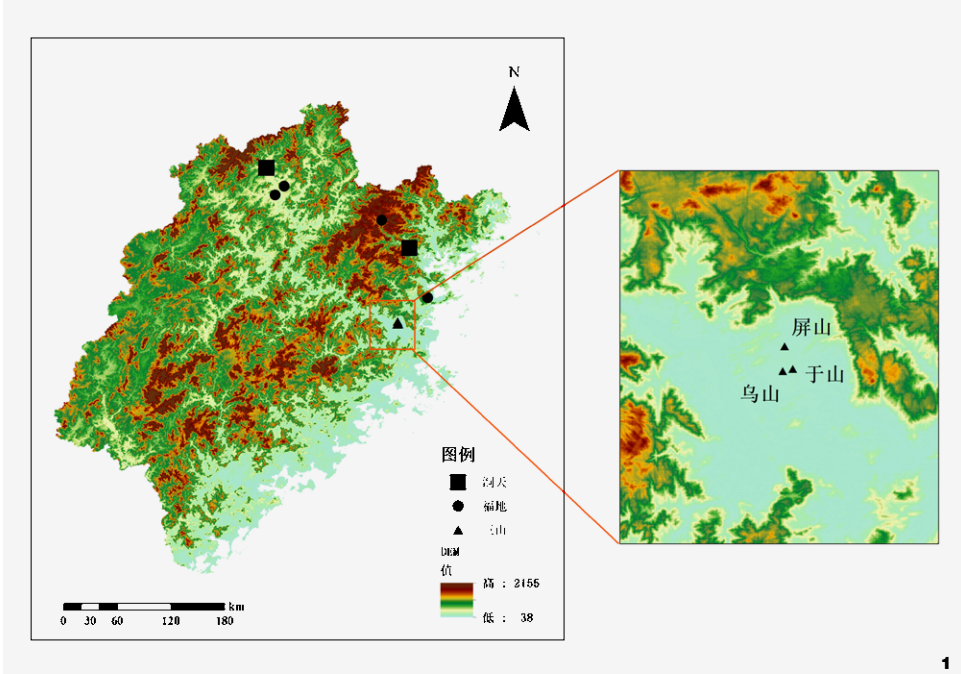


图1 福建三山和洞天福地分布图
Fig. 1 Map of Three Mountains and Taoist Nature Sanctuary in Fujian Province

1.1 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

卿希泰总结中国道教史后指出，20世纪80年代前处于道教研究的萌芽阶段。法国沙畹（E·Chowannes）^[11]在文章《投龙》中首次向西方介绍三十六洞天和七十二福地；西方学者又进一步创办了当今最权威的国际汉学刊物《通报》，集国外学者关于中国道教研究成果

于一体，提及泰山、茅山等与洞天福地相关山岳的情况，是西方研究洞天福地的开端^[12]；潘雨廷^[13]对洞天福地体系在历史中的地位进行详细考证，明确现今各自所在区域，发现洞天福地分布特征与其古文化保存状况具有密切关系，随后，不断有学者发表单个洞天福地的介绍性文章，如第五洞天青城山、第

表1 “福山”相关专著记载
Tab. 1 Records of monographs related to “Fukuyama”

专著 Monograph	作者 Author	涉及内容 Involved content	时间 Time	说明程度 Explanatory degree
《三山志》	梁克家	“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都督府” 下注明：“或曰：以董奉福山名。” ^[5]	宋淳熙九年	隐约提及
《福州府志》	李拔	“福山今名董奉山，属长乐县。” ^[6]	清乾隆二十七年	明确说明
《长乐六里志》	李永	“唐开元十三年，因州西有福山， 即长乐董奉山，改闽州为福州。” ^[7]	民国	明确说明
《福建通志·山经》	—	“福山在廉风里。” ^[8]	民国	明确说明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臧励蓀	“董风（奉）山在福建长乐县东。 产铁。” ^[9]	2015年	明确说明

十六洞天武夷山等，初步打开了国内学者对洞天福地的认知。东西方学者对于洞天福地的研究均大多停留在浅层介绍上，对于“洞天福地”在各个阶段、地区具体的景观变迁过程并没有进一步讨论。

1.2 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

到了20世纪90年代，洞天福地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涉及历史、哲学、园林、文学、绘画等层面。洞天福地的现实范围并不局限于山洞道观，还包含了周围的群山建筑、园林景观的广泛空间。龚剑锋^[14]从地域角度探讨了宋代浙江境内所有洞天福地的位置、园林景观及建筑壁画，发现古人在其景观建设中蕴含着园林的审美。洞天福地符号象征也是学者的探讨重点，法国傅飞岚 (Franciscus Verellen)^[15]指出东西方“洞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象，二者的关联性与“洞天”的形成时间和社会背景有关；三浦国雄是日本“洞天福地”研究的开拓者，《洞天福地小论》系统梳理了唐代以后洞天福地著录的相关内容，发现大小洞天、福地之间数字的关联意义^[16]，形成了东亚地区洞天福地研究的基础。这个阶段的研究大多从意识形态出发，对实际场地的考察还非常有限。

1.3 2000年后

2000年后，学者们对洞天福地的研究有了新的思考和新的方式。洞天福地集群在区域分布上带有明显的本土特征，大致划分为天师道发源地、江南地区和川汉地区^[17]。法国施舟人教授 (Kristofer Schipper)^[18]从时空观和宇宙观阐明霍童山霍林山洞作为第一洞天的缘由，认为宗教性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占据主要因素。近年随着洞天福地的关注度不断升高，对洞天福地的研究愈发趋向地域特

色研究，从全国大范围宏观层面转向特定区域的微观角度对其展开更加深入的探究，旨在将不同地区洞天福地的地域特色呈现于大众面前，目前以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和浙江农林大学金荷仙教授团队为国内洞天福地的研究主力。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从洞天福地的历史与发展、个案研究、文学与物质文化以及遗产保护4个专题展开研究；金荷仙教授团队则划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或特定区域对浙江^[19]、江西^[20]、河南^[21]、安徽等江南地区，从历史变迁、山水格局、景观特征、生态保护、风土民俗等多方面对洞天福地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总结^[22]，而福建、广州等地域尚缺少系统性研究。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侧重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金荷仙教授团队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偏好，并侧重整体。

洞天福地的形成与中国传统道教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其思想体现了传统“自然观”和“宇宙观”，甚至传播到了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泛东亚地区。以日本专修大学土屋昌明为首的研究团队从2009年开始对中国现存洞天福地进行实地考察 (均收录于学刊《洞天福地研究》第一号至第八号)，对洞天福地集群的历史文化和现场考察的综合研究，呈现出单个或多个洞天福地细节考证，考证和理论均有涉及，但区域联动性不足。

目前，国内外洞天福地研究的重心和深度主要集中在江南洞天福地集群，上述认知反映了东西方对于洞天福地研究具有明显差异，形成了东西方洞天福地景观研究的差异性和东亚各国洞天福地景观研究的异同性。

2 福建洞天福地

福建道教历经数千年的兴衰沉浮，形成了南北两个道教中心，福建洞天福地主要

分布在福建以北区域。目前福建共有霍林山洞、武夷山洞、焦源、洞宫山、勒溪、卢山6处洞天福地 (图1)。福建闽北作为全国洞天福地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洞天福地景观特征仍有巨大的挖掘意义，完善福建版块的相关研究，有利于完善全国洞天福地版图的系统性研究。

2.1 福建洞天福地地理考证

不同地域的洞天福地因地理环境、文化背景、民间习俗等因素而有所差异，探明洞天福地的地理方位是研究洞天福地体系的根本，而后才能探其本质。李会敏等^[23]学者利用GIS探明唐代定型的117处洞天福地空间分布特征，发现东北、云贵地区几乎没有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大部分处于500 m以下的丘陵地带。丘理真等^[24]从旅游角度探讨武夷山佛道文化、神话传说、现存宫观寺庙三个方面，论述了武夷山深厚的道教渊源；张晓虹^[25]基于道教历史和仙山体系的视角，从地理位置、文化渊源、历史变迁维度，呈现了武夷山的独特文化景观集群；林立志等^[26]通过考据和文献考察霍林山洞历代高僧的修行踪迹，揭示霍童山的修仙优势。另外，当代旅游书籍也对洞宫山的遗址、景观、历史进行深入的总结^[27]，展现了福建洞天福地的历史地位和景观价值。

霍童山和武夷山颇受众多学者关注，更多研究或从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角度，而其余4福地有一些介绍性研究，缺乏更深入和系统的考证。因此，为了更加全面了解和保护福建地区的洞天福地，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它们的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

2.2 福建洞天福地历史文化

洞天福地是道家求仙问道的地理乌托

邦, 在这个道教仙山体系中, 除了名山海岛仙草构成的自然本底, 还有宗教文化信仰的区域特色, 众多地域的早期文化信仰成为洞天福地衍生的文化基础, 梳理福建文化体系是研究福建洞天福地的重要基础。

2.2.1 闽越文化与神仙信仰

道教祖师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与巴蜀地区的巫风关系密切, 道教形成以原始信仰为思想基础^[28]。福建民间信仰已十分盛行, 受交通阻隔, 福建的地理环境与原本文化历史融合产生自己的信仰体系, 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崇拜等^[29], 福建早期的民间信仰为道教提供思想土壤, 巫道同源, 对道教具有较强的接纳性, 二者相互吸收。另外, 福建自成闽人风格的神仙体系, 如天姥崇拜、武夷君信仰、妈祖崇拜等, 成为福建道教的信仰底色。“闽山水之富, 甲于东南。武夷、太姆、石竹、霍童皆称奇绝, 实神仙之洞府而贤流之壑宅也”^[30], 闽地的山岳成为道人隐居修仙的最佳场所。闽越文化与神仙信仰的融合形成了武夷山道教文化基础^[31]。世俗崇拜的背后是科学缺失和社会落后的表现, 人类与大自然博弈过程中, 从畏惧、崇拜自然到希望得到大自然的庇佑, 如武夷悬棺葬文化便是希望逝者灵魂通过无限接近上天的方式得以羽化升仙^[32], 与洞天福地的核心内涵极为相似。神仙思想与闽越文化同为道教的思想来源, 为道教洞天福地思想体系构建奠定了基础。

2.2.2 “儒释道”文化并存

福建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 作为多元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 福建“儒释道”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当代学者立足于宗教对洞天福地展开研究, 但多是从道教本身出

发, 少有研究将三种文化分合情况与洞天福地发展相联系。

魏晋时期, 初入闽地的道教内核较为纯粹, 将与大自然的接触作为修行的重要活动, 并未受到其他文化浸染。林拓^[33]在探究唐宋以前的佛道分布、传播的地域形态中发现, 佛道两教传入与移民路线基本一致, 两个入口分别为闽东霍童山和闽北武夷山。各地移民信徒开始为闽地各处文化披上佛道外衣, 去除巫鬼思想, 进入更高级的文化层次^[34]。佛教传入闽地早于道教开启本土化进程, 而道教作为本土文化在闽地洞天福地思想中占主导地位, 儒学作为封建制度的思想支柱, 当时呈现出三者地位之争的情况, 彼此独立, 相互间也有影响。随着道教体系的完善, 特别是到唐宋时期, “儒释道”文化发展进入全盛时期, 各个朝代对三者呈现不同的政治偏好, 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策略深刻影响“儒释道”的关系走向^[35]; 罗素·柯克兰 (Russell Kirkland) 从中国政治背景角度, 指出道教在封建统治中的历史地位, 政权发展对洞天福地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36]。权贵富商间掀起一阵“舍宅为寺”的思潮, 寺观数量激增, 寺观功能也从追求羽化登仙的人间圣境转变为敬香祭祀的公共道场, 世俗化的转变促使三者逐渐走向融合。

明清时期以“儒释道”融合为主流趋势, 佛教逐渐中国化, 道、儒理论差异逐渐缩小, 三者合流倾向突显。林兆恩认为三者本出同源, 以“道释归儒, 儒归孔子”为教旨创立“三一教”, 至此福建“儒释道”文化合一, 从意识形态变为宗教形态^[37]。“东周出孔丘, 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化, 泰山与武夷”, 朱熹在武夷山创立新的儒学体系^[38], 促使武夷山成为复合文化名山, 深刻影响武夷山洞天福地思想的发展。邹义煜^[39]从武夷山“儒

释道”文化构成和相互关系论述了三者融合的发展演变和文化格局。霍童山山脊线的西南方向以鹤林宫为主的道教形胜, 东南向则围绕支提寺的佛教集群, 一山二名, 霍童山在“儒释道”的演变历史中具有特殊地位, 霍童民众长期浸染于这种文化环境。除思想层面外, 还反映洞天福地的景观、绘画等方面, 武夷山随处可见佛教“卐”标记和道教的“八卦图”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如武夷山的慧苑寺 (图2), 正殿为佛教典型建筑布局, 门厅则为儒家风格, 外墙壁画装饰为道教的八卦图, 是“儒释道”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与其他地域洞天福地不同, 福建洞天福地的复合名山文化展现了独特的文化构成和景观特征。

2.2.3 海潮与道韵: 海洋文化与道教文化的交融

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 远海求仙, 近海致富, 是中国古代沿海居民务实生活中的浪漫追求。道教作为本土宗教, 沿海居民拥有坚定的道教信仰, 因此, 海洋文化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道教与海洋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王巧玲^[40]从信仰、思想、理论维度论述了道教与海洋文化的关系。滨海地区自古为宗教发源地与传播地, 早在夏商时期就已出现各种海洋宗教祭祀, 夏敏^[41]从古代民间和官方两个维度指出海民通过宗教祭祀解决海洋问题, 福建东南沿海地区道教传播甚广, 道教信仰与海洋保持长期的互动关系, 通过海上祈福保证生产和生活的安全, 基于此产生了海洋崇拜。民众形成了信仰基础和宗教需求, 道教海洋信仰才有了产生的前提, 神仙信仰作为道教的核心, 道教海洋信仰自然产生了一批海神, 如南海观音、东海龙王和福建妈祖等。何桂花等^[42-43]从女性视角阐明道教神仙体系中女



图2 慧苑寺
Fig. 2 Hui Yuan Temple

仙系统的文化信仰和社会影响，福建妈祖是为抵抗海难而生的海神，妈祖祭祀民俗则是道教与海洋信仰结合的产物，妈祖的影响在福建海洋神仙谱系中也最为深远。此外，福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也促使沿海居民由崇拜、畏惧海洋向亲近海洋转变，海洋文化形成与演变进一步催生了道教海洋信仰。

2.2.4 易理与道韵：易学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共鸣

易学文化是自然和人类紧密联系的产物，也可看作道教文化的分支，但二者间又存在区别，前者因世俗生存需要而寻求现实理想环境，后者则是为了通达“仙境”寻找精神上的理想世界。福建易学作为易学两大派别理气派的主要代表，福建洞天福地也深受其影响，山川形势、水流、方位等地理环境也正是理气派所看重的，此外，宫观建筑的选址、朝向和布局直观体现了易学理念

和原则。

尽管国内洞天福地相关的易学研究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分析，如孙鹏^[44]从哲学视角阐述了“洞天福地”与“风水宝地”二者间精神追求的差异性和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吴卉^[45]从乡村文化景观视角对武夷山三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进行分析，指出其选址与布局中的风水格局存在共性；陈进国^[46]指出“龙脉”是选址的重要条件，与道教霍林山洞周围山川走势的“龙脉”是一致的。此外，福建的民居、宫观寺庙、家族宗祠、讲学书院、祠堂等建筑都极其讲究风水，闽北是洞天福地聚集的重心，洞天福地所在的山川形胜、衍生洞室、建筑布局、装饰元素及风格处处蕴含风水思想，聚落营建运用了“觅龙”“察砂”“观水”等方式^[47]。目前对福建洞天福地风水营建的探究相对较少，仍然值得深入探讨，进一步丰富洞天福地研究的历史维度。

2.2.5 古代艺术家审美意趣

在古代洞天绘画中，宗教符号及隐喻通过绘画语言展现洞天的神仙往来与道士修行形态。从道教的角度来看，神仙方术思想可能推动了绘画发展，包含道教义理和名山观念两个维度^[48]。六朝时期洞天观念盛行，随着山水审美观念和情趣的建立，特别是唐宋后期，洞天福地仙山观念对绘画表现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文人画家通过洞天福地的山水景观对内在精神进行通感转嫁。到了明清时期，以画述怀是洞天福地、神仙名山题材画作的高潮时期，涌现出大量经典的洞天绘画（图3）。张明学^[49]从明清山水画视角介绍晋代至初唐青山绿水与道教仙境思想的关联；姚莉芳^[50]则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阐述明清武夷山相关山水画作中的地域景观和空间特征，指出武夷山地域特色鲜明，文化意象突出。

洞天绘画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成熟，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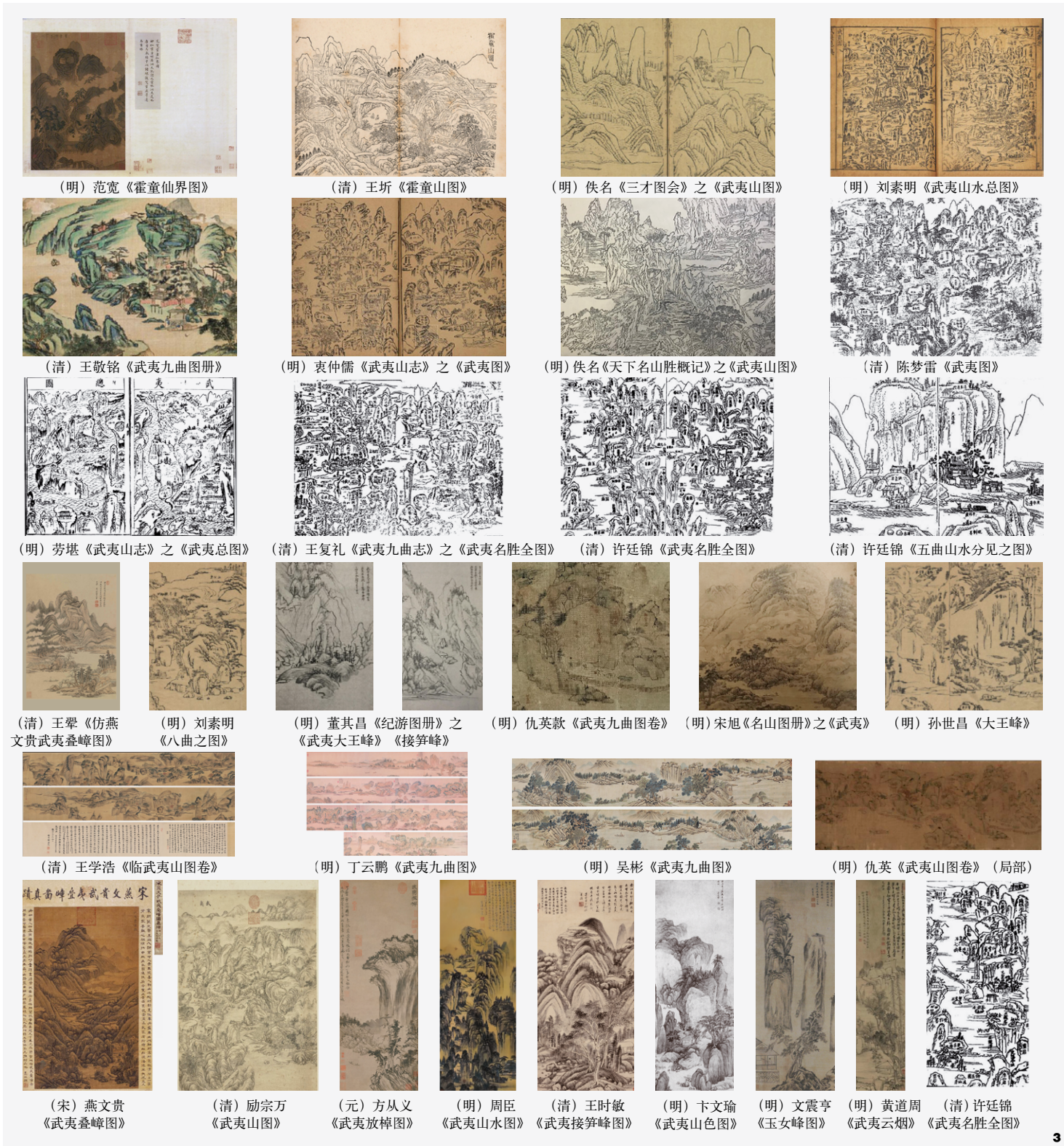


图3 福建洞天福地山水主题绘画(部分)
Fig. 3 Fujian's Taoist Nature Sanctuary landscape theme painting (part)

天在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洞穴、山道、林木、云气等皆可成为入画的景观要素^[51]。方宽所绘《霍童仙界图》最大特色是后景的拳状主峰，近景的廊桥水榭只是洞天入口，山洞本身则隐没于山林叠翠之间。入画要素并不刻意突出洞穴，从大量画作中可观，周围数千里乃至整个山川都可在入画范围之内。不难发现，福建洞天福地绘画主要集中于霍童山和武夷山，而后的画作数量远超前者，二者的历史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道教洞天福地与中国传统的绘画构建有着密切联系，而洞天绘画体现了画家内心的宇宙观，道教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值得深入研究。

2.3 福建洞天福地文化景观

2.3.1 名山大川

古代先民深信山岳之中寓居着神灵，对山岳始终怀着崇敬之心。福建洞天福地与纵横闽西北的武夷山脉，夹于鹫峰山脉和洞宫山脉两者之间的霍童山、洞宫山等紧密相关，想要探究福建的洞天福地必然绕不开福建山岳。

福建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令山岳保持原本风貌，不受外界侵扰，为洞天福地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现实载体。福建洞天福地的山岳选择都有一个共性，偏爱平原和丘陵，美国司马虚 (Michel Strickmann) 从西南民谣宗教文本的角度，探讨了南部地区道教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指出道教择山偏爱低矮但上山艰难的山岳^[52]。古代名山之所以成为名山，一方面取决于地理位置和山岳外观，吕自申^[53]从旅游视角论述了霍林山洞、武夷山洞、洞宫山所处的山岳情况和旅游资源，吴春明等^[54]采用考古调查报告的形式指出武夷山崖居聚落形成的特征；另一方面则取决当时环境中

人文因素影响程度，聂彤^[55]从霍童古镇传统聚落建筑形态视角展开对霍童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的介绍，曾文莉^[56]从地域景观、地域人文、地域风物三方面描述霍童山及支提山寺等建筑周围山海景观。霍童山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进入洞天福地名山系列。福建独有的山岳环境为洞天福地仙山体系形成提供了地理基础，使得洞天福地在现实世界中变得更加具象化。

2.3.2 原有生态环境

洞天福地基于传统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将自然与人联系起来，除择址名山外，原有生态环境也极其重要^[57]，作为洞天福地景观构成的要素之一，为福建洞天福地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霍林山洞之所以能成为洞天之首，除了宗教地位外，还归功于其优质的环境条件。远古海进时期，大小天湖和霍童山形成的“海上仙山”形态，是洞天福地理想的修仙格局。霍童盆地外高内低，依山临江傍海，提供充沛的水源，吸纳强大的负离子和地磁场，滋养了山中木、岸边人和水上民。多样的地形和温暖湿润的气候造就了霍童草药王国，盛产五色灵芝和野茶树，“山中宰相”陶弘景曾专门赶赴盛产“五芝”的大霍山采药炼丹^[58]。人生草木间，当地人接受来自山林的馈赠，丰富的物产衍生出了以草为食、以草为药、以草为茶及以草营收等一系列生产生活方式。霍童山的自然价值得以维系，除宗教信仰外，原住民的守护和需要才是洞天福地存于世间的的重要原因。

霍童的气候、物产、水源、负氧离子等优质环境条件，有利于修身养性，武夷山作为世界双遗产同样具有助益健康长寿的生态环境，肖敬禹等^[59]虽梳理武夷山生物

多样性研究进展，但并未涉及生物文化多样性相关研究；李立^[60]等利用遥感等数字景观手段，指出早期武夷山的生态环境质量较高，近年来由于人为干扰严重，遗产地部分区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受到较严重破坏，但目前对福建洞天福地的生态现状了解仍存在局限性。

2.3.3 洞室及衍生建筑

道者，小隐隐市朝，大隐隐山林，因追求神仙之道和宗教实践而择名山洞穴为理想居所。随着道教地域与人数的扩张，道教建筑承载的功能愈发多元化，其依托天然洞室衍生出一系列进行道教实践的景观要素 (图4)，后道士在洞室周围、名山之巅或繁华市井兴宫筑观。

洞天福地洞室及衍生建筑是道教信仰呈现与文化传播的现实载体，更是传承千年的人文景观^[62]。人们对宗教的认识是通过接触相关建筑及衍生物而形成的，道教传入福建后，道士仙人留下了许多宫观建筑和名胜遗产。朝代更迭，福建道教兴衰直接影响了道观建筑的演变^[63]。林拓^[64]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分析了道教入闽至唐宋时期的道教宫观特征、道士活动区域、宗派地理分布。除从地理、历史角度考察道教建筑外，不少学者还从宗教、绘画角度探究其职能变化。索林娜^[65]提出道观职能从早期私有化的传统道观变成世俗化的公共园林寺观；周梦涵^[66]基于景观图示语言的方式对武夷山89处人文景观进行调研和评价，指出多处道教遗存除了承担道教活动外，还充当其他文化信仰的宣传载体。

由此可见，道教深受世俗的浸染，修道之人与日俱增，当山中洞室无法满足当下的道教活动，便开始向外界延伸，道观逐渐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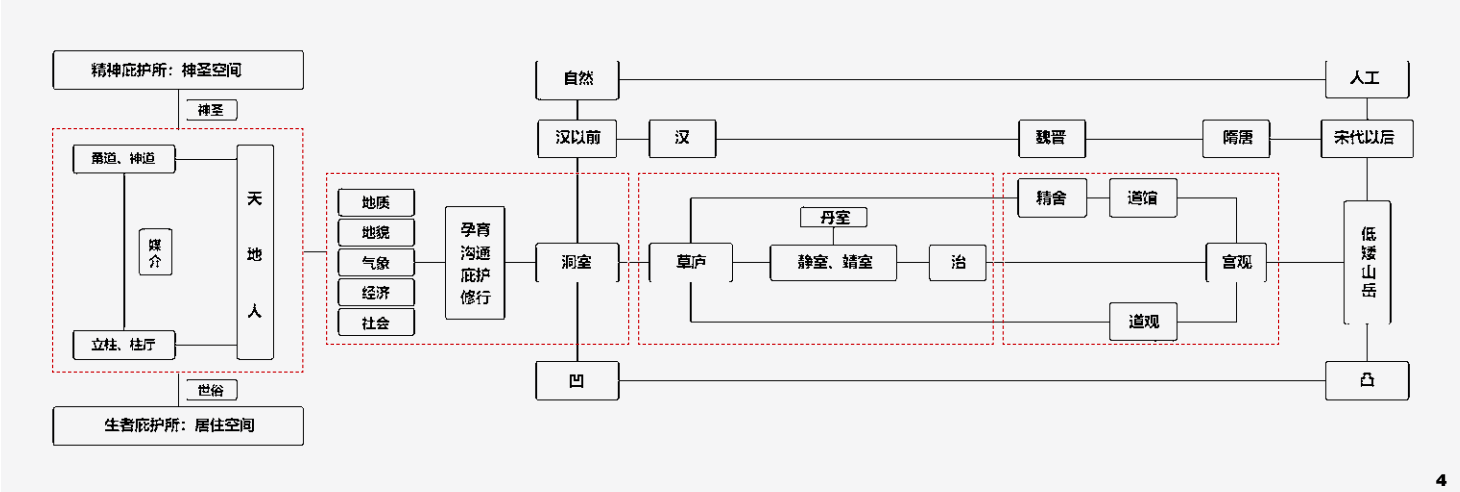


图4 福建洞天福地洞室及衍生景观要素演变脉络
Fig. 4 Evolution of the cave and derivative landscape elements of Fujian's Taoist Nature Sanctuary

代原始洞穴以供道士及普通民众求仙祭祀。福建洞天福地的宫观建筑受福建多元文化影响，从最初的私有化逐渐转变为公共化，极具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征，这也是福建洞天福地地域特色的另一重要特征。

3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福建洞天福地景观研究现状相关文献的梳理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对福建洞天福地的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地理考证、历史文化、宗教底蕴、洞室建筑、生态环境等，学科涵盖了风景园林学、建筑学、历史学、生态学、地理学、艺术学、宗教学、哲学等，范围广泛。(2) 目前已有浙江、江西等地域的洞天福地的整体性或个案研究，地域特征明显，而福建目前只有对霍林洞天和武夷山洞两个洞天的历史背景、宗教文化等方面进行探究，其余4个福地的专题研究几乎未提及，研究对象单一，且具有明显的偏好性，缺乏对福建洞天福地景观特征的挖掘，在风景园林领域的关注度不够。(3) 第一届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福建宁德召开，以“霍童洞天”拉开洞天福地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序幕，侧面说明各国各界对福建洞天福地地域研究的重视，但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对福建洞天福地的相关研究成果甚少。

洞天福地不仅注重文化内涵和生态思想，更着重于自然和人的互动关系及互动关系下形成的景观内涵，符合当下洞天福地申报世界遗产的热点趋势。近年来，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体系背景下，风景园林学科更进一步提出对宗教名山等特定地域的探究，并总结其景观特征，基于这一视角下对福建洞天福地进行持续性研究，结合数字景观手段，积极探索洞天福地蕴含的生态智慧，把握福建洞天福地未来的发展方向及其保护策略，同时也为助力“霍童洞天”作为洞天福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补充，利用“世界遗产保护”路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注：图3源自中华珍宝馆 (<https://g2.ltfc.net/home>)、藏宝馆APP、台北故宫博物院 (<https://openmuseum.tw/museum/npm>)、上海博物馆 (<https://www.shanghaiuseum.net/mu/frontend/pg/information/about>)；其余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参考文献

- [1] 朱水涌. 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监测与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 [2] (唐)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3] 陈才俊. 唐宋八大家精粹[M]. 宋思佳, 许祯, 注释.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15.
- [4] 卢美松. “福起州名”有何说[EB/OL]. (2023-04-14) [2024-04-05]. https://daj.fuzhou.gov.cn/zz/wszl/tslm/msfq/202304/t20230414_4585819.htm
- [5] (宋)梁克家. 三山志[M].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0.
- [6]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中国地方志集成 福建府县志辑1 乾隆福州府志I[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 [7] 福建省长乐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长乐县六里志[M]. 福州: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 1989.
- [8] 郝玉麟, 谢道承. 福建省志辑 乾隆 福建通志 第34册-第44册 全11册[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9] 减力禾.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 [10] 付其建. 试论道教洞天福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7.
- [11] CHAVANNES E. Le jet des Dragons[J]. Memoires Concernant l' Asie Orientale, 1919(3): 53-231.
- [12] 张崇富. 继承汉学传统: 荷兰道教研究的成就与最新进展[J]. 宗教学研究, 2010(03): 38-45.
- [13] 潘雨廷. 道教史发微[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4] 龚剑锋. 宋代浙江地区的洞天福地[J]. 中国道教, 1994(02): 49-51.

[15] VERELLEN F. The Beyond Within: Grotto-Heavens (Dongtian) in Taoist Ritual and Cosmology[J]. Cahiers d'Extrême-Asie, 1995: 265-290.

[16] (日)三浦国雄. 洞天福地小论[J]. 东方宗教, 1983(61): 4-5.

[17] 王冬亮. 洞天绘画研究[D].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 2023.

[18] 施舟人. 第一洞天: 闽东宁德霍童山初考[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16(1): 5-8.

[19] 郑青青, 金荷仙, 陈楚文. 道在山林, 周弥六合——浙东天台山“洞天福地”的山岳景观流变及文化意象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 36(12): 35-40.

[20] 吴会, 金荷仙. 江西洞天福地景观营建智慧[J]. 中国园林, 2020, 36(06): 28-32.

[21] 李祥, 金荷仙. 河南洞天福地文化溯源和景观空间特征探究[J]. 园林, 2023, 40(04): 102-108.

[22] 苗诗麒, 金荷仙, 王欣. 江南洞天福地景观布局特征[J]. 中国园林, 2017, 33(05): 56-63.

[23] 李会敏, 杨波, 周亮, 等. 基于“洞天福地”的中国“福地”分布探究[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16, 39(04): 8-16.

[24] 丘理真. 武夷山文化丛书 洞天佛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25] 张晓虹. 沧桑河山: 洞天福地[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7.

[26] 吕舟, 崔光海. 2019年第一届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1.

[27] 政和县洞宫山文化研究会编. 福地洞宫山[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0.

[28] 孙亦平. 历史与神话双重记载中的张道陵——以江苏沛丰文化为视角[J]. 宗教学研究, 2022(03): 12-18.

[29] 任海. 唐宋时期福建道教的文化地理学考察[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30] 郭伯苍. 沙合新港开塞合编 霞跼草堂集[M]. 福州: 1965年抄本.

[31] 华锋林. 武夷山道教遗存探讨[J]. 南方文物, 2016(04): 269-275.

[32] 林国平, 彭宇宇. 福建民间信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33] 林拓. 福建早期宗教信仰的地域形态[J]. 宗教学研究, 2004(02): 120-124.

[34] 林国平. 去巫化与正统化: 民间信仰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以福建民间信仰为例[J]. 世界宗教研究, 2013(01): 31-38.

[35] 李宇童. 明代三教图像研究[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24.

[36] KIRKLAND R. Ssu-ma Ch'eng-chen and the Role of Taoism in the Medieval Chinese Polity[J].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97, 31(2): 105-138.

[37] 何善蒙. 林兆恩“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浅析[J]. 华

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4): 7-13.

[38] 福建省文物局, 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 朱子福建事迹图集[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9.

[39] 邹义煜. 历史时期武夷山儒释道的构成及其关系[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8.

[40] 王巧玲. 论海洋文化对道教东部起源的催化[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1): 56-65.

[41] 苏涵. 福建海洋文化研究 第1辑[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

[42] 何桂花. 道教女仙的起源、信仰特征及其社会意义[D]. 泉州: 华侨大学, 2015.

[43] 王福梅. 妈祖信仰与道教关系调查研究[J]. 宗教学研究, 2010(04): 194-196.

[44] 孙鹏. 哲学视野中的“洞天福地”与“风水宝地”[J].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7(06): 93-97.

[45] 吴丹. 中国闽北乡村文化景观探究: 以福建武夷山为例[J]. 建筑知识, 2017, 37(07): 70-72.

[46] 陈进国. 风水的文化记忆与地域空间的意象化——以福建地区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06): 92-101.

[47] 本书编委会. 中国传统建筑解析与传承 福建卷[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48] 余绍宋. 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J]. 晨报副镌, 1926(57): 8-9.

[49] 张明学. 道教与明清文人画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50] 姚莉芳. 明清武夷山水题材绘画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22.

[51] 吴会, 金荷仙. “洞天福地”题材绘画中的仙境景观流变驱动力与呈现要素[J]. 中国园林, 2022, 38(01): 134-138.

[52] FAURE D. The Emperor in the Village: Representing the State in South China[J].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Oriental Publications, 1999, 54(1).

[53] 吕自申. 中国道教风景名胜游[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54] 吴春明, 佟珊. 武夷山崖上聚落[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2.

[55] 聂彤. 霍童古镇传统聚落建筑形态研究[D]. 泉州: 华侨大学, 2010.

[56] 曾文莉. 崔世召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6.

[57] 熊铁基. 道教洞天福地 生态文明的样板[J]. 中国宗教, 2015(03): 42-44.

[58] 王明. 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 论陶弘景[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06): 89.

[59] 肖敬禹, 何中声, 刘金福, 等. 武夷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J]. 武夷科学, 2021, 37(02): 81-92.

[60] 李立, 肖桂荣. 基于RSEI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分析[J]. 福建农业科技, 2021, 52(05): 63-70.

[61] 吴强. 面向SDG11.4的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遥感监测及评价研究[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2022.

[62] 胡诚林. 浅谈对道教名胜的保护与合理利用[J]. 中国道教, 2003(06): 21-24.

[63] 何敦铎. 福州道教文化的兴衰演变[J]. 闽江学院学报, 2005(03): 14-21.

[64] 林拓.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 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65] 索林娜. 宁德霍童乡村信仰文化人类学考察[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66] 周梦涵. 基于景观图式语言的武夷山国家公园人文景观空间语汇研究[D]. 福州: 福建农林大学, 2023.